



文化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

艾 斐

尽管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极为广泛,但最高层次上的文化理念,则永远都是一种以思想、精神、道德、情操、信仰和追求为质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由此而外化为人们美好的人生愿望和高度的行为自觉。这也就是说,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赋予人们以正确的思想、崇高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而又只有在正确思想、崇高道德和远大理想的支配下,才会使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期待和产生高度的文化自觉。因而,积极进步的、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特点和社会担当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永远是文化的主线。

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是文化创造的灵魂。文化的价值导向主要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而文化的精神追求,则主要是指文化对先进思想、崇高道德的涵育及其所产生的巨大而良好的社会效能。一切文化创造、文化形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论其表现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方式、具有什么特点、追求什么目标,其在终极效能上都应当和必须具有这样的价值和作用。古往今来,凡是被历史钤印、社会肯定、大众认同的文化产品,其在本质上都应具有这个特点并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韩非子》中说:“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文之文也。”其“文”就是对文章价值导向的强调与凸显。《论语》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否则,只“陈其数”而“失其义”,写得再多也不会有什么价值。在这里,“义”对于文化创造来说,既是价值导向,又是精神追求。这为一为文的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以极为强势的力量构建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塑造了中国的文明形象,并使从屈原到鲁迅的几千年中国文化始终都强烈地秉承着以“义”为核心的精神魂魄与价值追求。

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创造,都应当、必然和必须在这个前置与结论之间进行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从前置到结论,这不但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社会和文化空间,而且更是一个充满生力与魅力的思想空间和美学空间。所以,它完全可以给大容量和高品位的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提供最丰富的养料和极其优渥的条件,以其特有的精神内蕴与美学资源促使文化精品的产生。其实,任何文化精品和文艺佳构的产生,都是发生和发展于这一特定的思想空间与美学空间之中的。之所以如此,惟因这个空间从来就是以正确而积极价值标准与价值追求作为矩范和动力的。一旦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任凭作者纵横捭阖、恣肆挥洒、率性驭笔,也都可以做到“不逾矩”,不论他写什么和怎样写,都会始终洋溢着思想的新潮,閃

耀着艺术的光彩。社会是发展的,时代是进步的,人以及人的思想内蕴、精神诉求和生活方式等,也都是在不断的流转和变革中寻求着新的突破和实现着新的提升的。与此同时,文化自然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和流转。而其中的变革和创新则是文化获得激情与诗意、实现发展与提升的有效方式和必经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凡“变”必升、凡“新”必优,关键还在于变什么?如何变?究竟“创”在哪里?“新”在何处?因为只有因“变”而达优、因“新”而臻美的情况下,“变”和“新”才会具有创新价值和发挥积极作用,也才真正是本质意义上的变革与创新。

缺乏精神含量无法酿造优秀的作品。显然,对于现在兴时行世的流行文化来说,并不是主体缺乏才华、知识、技能以及对精神创造和艺术创新的激情、向往与追求,更不是客观上不具备酿成足以立世、铭世、传世之文化巨人与文艺杰作的环境、条件与资源,而在许多时候和许多情况下,所缺乏的恰恰是科学、正确、积极、先进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当然,这种缺乏并不是时代、社会和生活造成的,而主要还是文化主体在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中,对正确、先进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的自觉不自觉地排斥、放逐以至消解所造成的。比如,在以私人话语和个体经验为主要依托的创作中,对公共价值的稀释;在通过隐私的裸露和欲望的舒张而凸显自足自恋心理冀求的过程中,对大众情感的闭锁;在沉溺于琐屑乃至低俗的时尚刺激与小资情调时,对崇高与正义的悖逆;在着意表现“本能化”、“生理化”、“感官化”、“欲望化”的过程中,对伦常世理的否抑;在所谓纯“娱乐”、“大”、“恶搞”、“土”、“调侃”、“洋”、“戏谑”的颠覆性叙事中,对良知和理性的撕裂;在曲意改变向度、刻意寻觅卖点、纯然追求享乐、极度崇尚消费的所谓“时尚化”和“私人化”行文中,对文化道义与社会良知的销蚀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在某一文化层面上表现了对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的放逐与亏缺。因为一切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在本土上就都是一种趋新、求真、弘善、臻美的精神创造与思想引导,就都是一种对良知和道德的救赎、升华与强化。所以,在其创造机制和社会功能中,一旦被生理化取代了社会性、娱乐化屏蔽了义理性、利欲化腌渍了功德性、恣意化支配了规约性、附庸化替代了先导性、低俗化消解了崇高性,那它就必定会在失去本体价值的同时也失去其本应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审美功能。其结果,就像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精神产品及其创造者们一旦将高筑于民族利益和人民

立场之上的崇高、正义、公理、奉献等观念、情感和追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的时候,那它就必然会在形态、性质和功能上变为精神的疣物,其价值和意义的畸变与消解自在所难免。

积极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赋予伟大作品生命力。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显然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流转期,这不仅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也得益于良好的社会条件。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结构、文化范式、文化语境,乃至文化的表达套路和实现方略等,都在大范畴和深层次上发生了变革和进行了创新,遂使整个文化面貌焕然一新。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庆幸的。但也正是在这种由快速流转和现象纷繁所造成的热闹景象中,却往往淡化了对价值导向的循守和对精神追求的热忱与执着,并由此而造成了一些文化产品的思想脱节与精神贫乏。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尽管“新锐”、“前卫”、“新写实”、“后现代”之类的口号和旗帜层出不穷,但却鲜有力可扛鼎的作品出现;尽管“奇幻”、“悬疑”、“侦探”、“盗墓”、“穿越”、“耽美”之类的名目和称谓让人目不暇接,但却越来越使受众对文学的热情与眷顾趋于冷淡和消敛;尽管现在每年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很大,随便一个年份的作品产量都可大大超过前十七年的文学出版总量,但其所葆有的艺术感召力和影响力却越来越萎缩、越式微,就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也难得让人悉数记住和叫出它们的名字。而就作品本身而言,关键又在于文学

的生活底子虚了,目标追求变了;真情实感少了,主体欲望多了;思想内蕴小了,外部形体大了;艺术功力差了,私语雕痕多了;责任意识弱了,自恋心理重了;“大我”、“主潮”淡了,俗情琐务浓了;人民大众远了,审美眼光短了;时代精神稀了,“自我表现”强了。凡此种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的易质与缺位。对于伟大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不起什么作用的文化产品与文艺作品,自然不会赋有可贵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就自然不会得到大众的接受和社会的认同。这,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

伟大的时代,应当产生伟大的作品,也最有条件和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关键就在于创作主体写什么和怎样写。而写什么和怎样写所检测和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智能、技巧和才情,而且更是作家的眼光、胸怀和见识,当这一切都在时代精神与生活质地的调动下逐渐聚焦于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这一质点与亮点上的时候,创作也就自然会进入最佳境界,并有望成为精品与宏构而熠然问世。这并不是梦想,而是充满热切期望的预言。因为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一旦回到正确、积极、先进、丰赡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的驱动之下,它就会焕发旺盛的生机和结出丰硕的果实。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心灵和大脑,那么,正确、积极、先进、丰赡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则就是最能赋予这心灵和大脑以旺盛创造力的血脉与经络,并由此而为文化筑起永具活力的生命线和价值链。



绿满藏乡

袁宏摄影

我写《走向天安门》

石 英

有才、赵玉林他们的曲调”。然而,在那个大大时代中,在残酷的、黑白分明的对抗中,任何的斗争形式,都不能游离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轮轨之外,都属于整个大决战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一种大智大勇的品格、一种视死如归的气节、一种克服千难万险去争取胜利的信念,贯穿于全集,构成为短诗的精髓。在这方面,最典型、最鲜明的体现则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以宝贵的生命昭然而成的革命斗争之魂,他们中的最杰出、最壮烈的代表,当名垂中华青史而无愧。有他们的出现,一部革命史才更加灿烂生辉,一部诗集才更能生发出高格。

革命烈士本身就是诗魂,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上。今天有人不相信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存在,非要将英雄流于卑俗,才算表现“真实”。其实,卑俗是与真正的诗魂不能并存的。诗集中写方志敏烈士就是真正的无私精神。“又过了十四年/开国大典时/他呼吸在赣东北的一个小村/新鲜空气里/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人们仰望城楼的一角/有一本《可爱的中国》”。爱国者的诗魂常在,肉躯不存又何憾之有?

以平白的诗句来叙述事件肯定是苍白的。作为短诗,理应要求每首诗中都应该有闪光的眼睛,这种诗眼透射出的光色才是真正的诗化的品格。它不仅是崇高向上的,甚至有时还是壮丽的、潇洒的。诗的精神如果不能达到相当的审美高度,那么作为诗的精神还不能产生出足够的感人力量。“他坚

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文学批评在传媒时代与前传媒时代的区别;二是文学批评可能受到媒介干扰或传媒的推波助澜。

传媒发达了当然是好事,不能因为鼓噪太多就一味指责传媒。至于文学批评的不景气或者所谓“酷”评和“恶”评的存在,到底与传媒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陈晓明认为:“一方面以前文学批评的生存空间——文学期刊变得边缘化,其结果也使文学批评边缘化;另一方面,在报业市场化、报纸追求‘眼球’效应的背景下,纯学术阐释式的文学批评被拒之千里,使得文学批评再难给文学的经典化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代之的是满眼所见的‘酷评’甚至‘恶评’,一些专业的文学批评在此便被武断地格式化。”

南帆在批评底层书写的时候,认为学者的真知灼见是供研究用的,与大众理解的文学还不太一样。事实上,文学一直存在主流文学与大众文学之分。传统学院派批评更多关注的是主流文学,因此批评主要是向职业化方向迈进的。传媒兴起以后,文学的市场化需求需要传媒的救助。这样主流文学向传媒倾斜,使得个人化批评开始充斥市面。的确,传媒散布的文学批评与学院批评存在很大的区别。除专业的几本文学批评类期刊,一般报刊不愿意登载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个中原因很多,至少是占版面不经济。传媒批评更倾向于短平快,说穿了是为出版服务,信息功能大于学术功能。这两种批评方式的职能各有所长,功能自然不同。传媒使得文学批评出现了流变。当一个时期人们集中对创作提出这样那样的诟病,文学批评更难逃其咎。我们既不鼓励“民粹”式地呼喊“文学死了”的论调,更不愿听

到诸如“文学在发展中进取”这样不痛不痒的总结。带着整体观的思维全面分析文学批评的不足是当务之急的工作。特别是批评主体的扩大和批评载体的泛化后更要警惕批评的流俗化倾向。媒体时代的“动态的批评”肯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因于文学批评的不同和批评外部语境的差异,批评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话语方式,读者也可以对同一篇作品吸收不同批评者的观点。所以这里的“动态”是文学批评的“常态”,也是批评的独特性所在。批评既不是垄断的,也不是无秩序的乱发一通“言论”,说到底它仍旧是“一种学问”,虽不是以“知识”作为惟一性,但也绝非没有“知识”的。同样道理,文学批评虽不是以人人都能看懂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但也不是到了除了批评者外没人能够看懂为止。因此,文学批评既不是“束之高阁”的通灵宝物,更不是退至市井干与恶俗交流的市俗小儿。以我狭隘的理解,批评应是穿越与洞察作家心灵的“宝莲灯”,既有人间奇魔力的高贵之气又有入神烟火的素朴之心。正如蔡义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之双向目的,绝非是封闭的“孤芳自赏”或是伴之以“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言之有物是起码的要求,目中有人是基本的常识。

我们期待“有效”的批评理应是一种精神追求,至于方式方法那是一种底气与智慧的融合。有效的批评是辩证的,可以在一个更大存在的语境中来揭示局部现象的各种封闭,以否定性的思维来打开局部的局限性;可以在文化与社会或者说文本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局部与整体、抽象与具体的辩证联系;可以克服在认识过程必然遭遇到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矛盾,完成从历史的“文本”走向历史的“真实”的运动,最终达成对历史必然性的总体把握。对批评动态的审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相砥砺,共同构成文学批评的表征。



《誓言永恒》与近期火爆荧屏的同类作品《潜伏》,堪称相互映衬的姊妹篇,共同构成了一种可喜的艺术现象。

剧作高扬英雄主义,充沛着爱国主义精神,承载着社会主流意识,且将主旋律作品进行类型化书写。全剧围绕两条线索交织递进。一条时空线是现实——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围绕我方在四川开展导弹研究展开的敌我双方角逐搏杀;台湾派敌特势力潜入四川,会同他们在大陆潜伏下的间谍与叛徒,千方百计打入我反间谍机构和核研究机构。与此同时,我反间谍机构一方面引“蛇”出洞、引“鳖”入瓮,另一方面又派人打入香港敌特机构,搅乱敌人的部署,借力打力全力保卫我导弹研究基地。第二条时空线是往事——40年代我方潜入国民党保密局的川北小组,被叛徒出卖而陷落。那个叛徒一直潜伏下来,并伙同台湾特务里应外合欲疯狂破坏我导弹研究基地。与之相应的是,我方反间谍局通过各种渠道欲查出这个潜伏至今的叛徒。两条矛盾线索交叉作为这部作品的情节主轴,剑拔弩张地贯穿全剧,险象环生,危机重重,疑云密布,让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而我们反间谍英雄——许子风、朱学峰等人,便在这场有关国家大计的生死较量之间,随着情节的递进,人物性格和命运、情感与精神得以充盈而鲜活的呈现。这种成熟的谍战类型样式又同年代戏样式糅合在一起,让这场生死较量置入60年代那种艰苦而纯真、严峻而充满理想精神的年代氛围里,有一种令人追怀的往事感,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艺术韵味。

《誓言永恒》成功地塑造了许子风、朱学峰、骆战等两代国安战士的系列形象,使这部剧作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卓尔不群。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是他们共同的性格底色。他们忠诚忘我地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责,默默无闻,不为人

知,勇于挺身,甘于牺牲。作品所弘扬的这种爱国主义的大胸怀、大境界、大作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是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的精神补钙和久违了的精神洗礼!弥足珍贵的是,作品中的国安战士形象,以个性鲜明内心世界丰富而将获得内涵丰富的艺术生命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作品将镜头对准许子风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他在选择之间所经受的磨难与痛苦,凸显了他过人的坚毅和对国家、对职责的一片赤诚。

摆在对他面前的又一个选择,都关乎国家大局安危,为此他不得不忍痛割舍战友情、亲情、人情,而独自承担牵挂、独自咀嚼被世人诟病的悲情。他在超越一个又一个命运难题之际,袒露出可敬可爱的忠诚卫士的情怀。朱学峰的忍辱负重,被这部作品推向极致。为了打入国民党间谍组织,获取敌人战略情报,他必须获得敌人信赖,必须骗过潜伏在我方队伍的间谍耳目。为此,他要背负叛国的恶名,要忍受叛亲离,还要经受住敌人种种灵与肉的摧残考验。他在敌垒中独自作战,他对国家、战友、亲人的忠诚被推向极致,从反向日铭心刻骨地呈现出来,令人震撼。

内容为王,叙事为先。《誓言永恒》的叙述手段的独特之处,是把观众对剧情进展的预期巧妙地引向歧路,让观众对意料之外的审美满足。前几集中,许子风、魏局长对朱学峰的冷酷不公会被观众诟骂指责,同样杜仙萍的四处打听消息、背后拨弄是非,让人对这个“国安战士”生疑生厌,随着剧情进展,方知一切都是合情合理。这些情节的铺排都显示了编导的精心构思。

尽管作品也有明显疏漏,比如隐藏在大陆的敌特分子在成都交接情报,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令人有违快感。我反间谍局总部召开秘密会议,房门大开,站岗的士兵都能听到等等。但该剧在悬念丛生的精彩故事中蕴藏着一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信仰,艺术表现力与社会责任兼备,不失为主旋律电视剧作品的精彩之作。



新作鉴赏

广西作家宇兰近年来创作的散文随笔集萃《守住一束光》,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中既有作者对市井生活的感悟、游历见闻,也有艺术鉴赏与评析和音乐随感。那些唯美缠绵的文字带着读者渐渐走近墨脱,漫步法兰克福,追寻佛尔施塔的“月亮图腾”,或者走进法国电视台去观看毕加索作画,或寻一寻梦中的漓江,领略一下南国陋巷的繁华……

作者总是好奇而诗意地品味各种人情物态,畅快地联想,悄悄地幽默,在平凡中揭示优美,从现象中发掘哲理。(文 一)

《守住一束光》出版

6月18日,国内首份立足互联网的新闻周报《网络导报》正式创刊,该报定位于报道社会热点的网络反馈以及服务读者的网络生活。

据该报负责人介绍,中国有3亿网民,但绝大多数网民属于掌握简单上网技能、仅了解有限网站和频道的“浅度网民”,但不断增长庞大的消费群体对网络生活有更深入、更高端的需求。《网络导报》在创刊同期还推出了同名网站,除在网站上展现报纸电子版,还将陆续推出多种论坛及多项服务,请网民参与论报,真正实现报网互动。(吕 进)

《网络导报》创刊

“大国策”丛书专家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来自国内各界研究机构的专家围绕“大国的战略”主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和外交等不同视角展开深入讨论。

“大国策”系列从书研讨会,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与会专家阐述了中国崛起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

“大国策”丛书共分40多册,集结当代中国顶级“谋士”和“智囊”,荟萃学者五六百人之智慧,以前瞻性的视角和全球视野,从战略高度全面思考中国未来40年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集中探讨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舒 平)



创作心语

专家研讨『大国策』丛书